

职业代际流动性与中国劳动力市场化

单爽*

摘要: 本文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2013 年、2015 年和 2017 年的数据,使用 logit 模型,分析了中国职业代际流动固化问题及其对中国劳动力市场化的影响。研究发现,子女从事与其父母同类型职业的概率更高,且父母职业对其子女职业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市场路径实现的;母亲职业对其子女职业的影响更大,但通过非市场路径造成的影响较小;受教育水平是影响职业类型最主要的因素,尤其是接受过高等教育,可以非常显著地提升其从事脑力劳动职业的概率;虽然在各组样本中,子女职业类型都会受到其父母职业类型的影响,但对于西部地区和非农户口样本,通过非市场路径带来的影响更为显著;职业代际传递使我国劳动力市场化程度降低了不足 11.14%,对中国劳动力市场化程度的影响有限。

关键词: 职业;代际流动;劳动力市场;市场化

中图分类号: F241.2

一、引言

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父母与其子女之间的代际流动固化问题。代际流动固化既会影响劳动力市场上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降低劳动力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阻碍新发展格局的构建,又会阻断年轻人的上升渠道,妨碍共同富裕的实现。劳动力市场上的代际流动固化可用职业代际流动固化来描述,即父母职业会显著影响其子女的职业,令其难以实现职业代际流动。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破除妨碍劳动力、人才流动的体制和政策弊端,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提高职业代际流动性,对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防止阶层固化,推动经济发展,实现共同富裕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以此为出发点,本文分析了中国劳动力市场上的职业代际流动情况,并估计了其对中国劳动力市场化程度的影响,主要关注问题如下:第一,中国是否存在职业代际流动固化问题;第二,如果存在职业代际流动固化问题,那么其对中国劳动力市场化程度的影响有多大;第三,不同群体的职业代际流动性是否存在差异。本文基于中国综合社会综合调查 2013 年、2015 年和 2017 年的数据,将职业分为体力劳动职业和脑力劳动职业两种,将父母职业对

*单爽,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城乡建设经济系,邮政编码:100835,电子信箱:365663828@qq.com。

本文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经济自发展能力研究”(批准号:15ZDB133)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京津冀城乡融合机理及地域模式研究”(批准号:41901216)的资助。感谢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作者文责自负。

其子女职业的影响路径分为市场路径和非市场路径两条,使用 logit 模型,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

本文的结果表明,在中国,子女职业与其父母职业显著正相关,子女选择从事与其父母相同职业的可能性更高,市场路径是父母职业影响其子女职业的主要路径;父母职业对其子女职业的影响不同,相比较而言,母亲职业的影响更大,但通过非市场路径的影响更小;虽然职业代际流动固化问题会降低劳动力市场化程度,但在我国,其影响有限,仅使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化程度降低了不足 11.14%;对不同地区和户籍类型样本的分析皆表明,子女选择从事与其父母相同职业的可能性更高,且市场路径的影响要明显大于非市场路径;虽然市场路径的影响更大,但西部地区劳动者与东部、中部地区劳动者相比,非农户口劳动者与农业户口劳动者相比,父母职业对其子女职业的非市场路径影响都更显著;受教育水平,尤其是接受过高等教育,是对子女获得脑力劳动职业概率影响最大的因素。

本文余下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第三部分为理论逻辑,第四部分为变量设定和统计描述,第五部分为计量模型及实证方法,第六部分为实证结果,第七部分为结论及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研究代际流动性的角度有很多,其中基于 Becker 和 Tomes(1979)建立的模型,针对代际收入弹性开展的研究最为丰富。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职业代际流动性。与工资收入相比,通过职业变量对代际流动性进行研究具有很多优势。首先,由于无法准确估计样本的一生总收入,衰减不一致问题是无法避免的,即使使用多年平均收入作为代理变量也仅能做到减小偏误,无法消除偏误(Solon, 1992; Zimmerman, 1992)。其次,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职业更能代表样本长期的经济地位情况(Goldberger, 1989; Zimmerman, 1992)。再次,很多关于工资收入的数据都是通过样本回忆的方式获得的,以此种方式得到的数据容易出现较大的测量误差,而对职业的回亿通常要比对工资的回亿准确得多。

由于子承父业的传统和劳动力市场上女性的劳动参与率较低,目前关于职业代际流动性的研究关注的多是父亲和儿子之间的职业相关性,因此在研究中使用的样本也大多为父子样本。Long 和 Ferrie(2013)使用转换矩阵对美国 and 英国父子间的职业代际流动性进行了分析,发现美国 1850—1880 年间的职业代际流动性高于同期的英国且高于现代的美国。Mazumder 和 Acosta(2015)通过职业声望研究了美国父子间的职业相关性,发现使用职业声望对代际流动性进行分析时,分析结果也会存在衰减偏误,且在儿子职业中期时衰减偏误最小。Feigenbaum(2018)通过转换矩阵分析了美国爱荷华州父子间的职业代际流动情况,发现 20 世纪早期以来,爱荷华州的职业代际流动性下降了,且农村孩子的职业代际流动性比城市孩子要高。Modalsli(2017)使用转换矩阵进行分析,发现挪威父子间的职业代际流动性随时间推移呈下降趋势。

除了父子样本之外,也有部分学者对父女、母子、母女样本进行了研究。Hellerstein 和 Morrill(2011)使用多项 logit 模型对美国父女间的职业代际流动性进行了研究,发现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提升提高了父亲对女儿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激励,且女儿从事与父亲相同职业的概率比从事其他职业至少要高 20%。Hout(2018)对美国父母与子女之间职业地位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美国劳动者的职业地位显著地受到其父母职业地位的影响,在以双亲或以

父亲收入为家庭收入来源的家庭中,父母或父亲的职业地位升高1分;则其子女的职业地位升高0.5分;在以双亲收入为家庭收入来源的家庭中,男性和女性职业地位受其父母职业地位的影响差异不大,但在以母亲收入为家庭收入来源的家庭中,较男性而言,女性的职业地位受其父母职业地位的影响更大。

由于缺乏数据,对于中国职业代际流动性的研究起步较晚。总体来看,在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上,父母从事的职业与其子女从事的职业具有较强的相关性,但是这种相关性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黄衍华和乔晓春(2017)使用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1%样本,通过对父母与子女之间的职业地位进行分析,发现父母与子女之间的职业代际流动性较弱,较父亲而言,母亲职业地位对子女职业地位的影响更大。到了改革开放中期之后,这种代际流动性进一步减弱,但父亲在高收入行业工作会显著提升子代进入高收入行业的概率(许庆红,2018)。张桂金等(2016)将中国职业代际流动固化问题的研究从二代人拓展到了三代人,发现在1980年以前出生的劳动者所处阶层受到祖代的影响较小,但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孙代的职业阶层不但会受到父代职业阶层的影响,还会受到祖代职业阶层的显著影响。此外,虽然接受教育可以帮助劳动者向更高的职业阶层流动,但是家庭背景对劳动者的受教育水平存在较大的影响。张顺和祝毅(2017)发现,城市居民中的中上层、上层代际职业地位继承性较高,中层及以下阶层的代际职业继承性相对较低。褚翠翠和孙旭(2019)发现,近40年来中国职业代际流动性呈波浪式发展,1970年代职业地位的代际流动性最高,1980年代职业地位的代际流动性最低,1990年代职业地位的代际流动性介于两者之间。总体而言,关于中国的研究仍集中于父亲对子女的影响。

与上述文献相比,本文的创新点在于:第一,不仅考虑父亲职业对子女职业的影响,同时也将母亲职业纳入了考量;第二,将父母职业对子女职业的影响路径分为市场路径和非市场路径,分别对两条路径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第三,分析职业代际流动如何影响劳动力市场化程度,并测度了影响大小。

三、理论逻辑

在竞争性的市场上,个人的职业应由其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决定。对于家庭背景较好的劳动者,一方面由于其父母的能力较强,所以其可能会具备更高的天赋(如智商);另一方面由于其父母的收入较高,对其人力资本进行投资的能力也更强。因此,劳动者的家庭背景通常与其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呈正相关关系,由这部分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导致的职业差异是市场机制作用的正常结果。然而除此之外,家庭背景较好的劳动者还可以通过其父母的社会地位、社会关系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得更好的工作机会,这种非市场因素的影响会导致职业与人力资本积累水平的偏离,破坏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在上述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家庭背景较好的劳动者通常会从事脑力劳动职业,而父母从事脑力劳动职业又通常是导致家庭背景较好的重要原因,这就造成了职业代际流动固化问题。

职业代际流动固化问题是职业代际传递的直接结果。职业代际传递的路径可以分为两条,一条通过市场机制实现,可以称之为市场路径。通过市场路径实现职业代际传递的主要影响因素为人力资本和个人偏好。另一条路径通过市场机制之外的其他途径实现,可称为非市场路径。非市场路径实现职业代际传递主要通过社会关系。已有研究表明劳动者的职业获得会受到非市场因素的显著影响。Loury(2006)发现,高达50%的劳动者的工作是通过

家庭、朋友和熟人找到的。此外,Di Pietro 和 Urwin(2003)发现,孩子的成绩显著依赖于其父母,尤其是父亲的社会地位,且父子之间的联系强于父女之间的联系,母女之间的联系强于母子之间的联系。Carmichael(2000)也表明,子女地位与父母地位高度相关,儿子的职业获得十分依赖于父亲的社会经济地位,且高收入家庭的代际传递性更强。这些研究都表明了父母的社会地位与其子女的职业有着很强的相关性。下面对这两种职业代际传递路径分别进行分析。

首先考虑市场路径。市场路径中最为重要的因素是人力资本。本文将决定个人劳动边际生产力水平的人力资本分为普通人力资本和特殊人力资本,普通人力资本指的是对于各个职业劳动边际生产力贡献相同的人力资本,主要通过义务性初等、中等教育及高等教育中的基础课程等途径进行积累;特殊人力资本指的是仅能提高特定职业劳动边际生产力的人力资本,主要通过中等、高等教育中的职业教育及专业课程、工作经验、相关培训等方式进行积累。这两种人力资本积累都会受到父母职业的影响。对于普通人力资本来说,由于从事脑力劳动职业的父母拥有较高收入且可能更重视人力资本积累,其可以也更可能为子女进行更多的人力资本投资,从而使子女具有更高的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就特殊人力资本而言,一方面,同样由于上述因素,对于从事脑力劳动职业的父母而言,其子女的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可能更高。另一方面,父母职业还可通过以下两种途径影响子女职业:一是成长环境。由于受到父母的耳濡目染,相对于其他职业而言,子女对父母所从事的职业显然会更加了解,正如一个经营饭店的家庭抚养的孩子显然比一对经济学教授夫妇的子女更加了解怎样经营好一家饭店,潜移默化和言传身教都会帮助子女积累与其父母从事职业相关的特殊人力资本,这可能会使子女更倾向于选择与其父母相同的职业。二是个人偏好。由于父母职业很有可能是其子女最了解的职业,因而父母职业对子女的职业偏好也会产生一定影响。

再来考虑非市场路径的实现机制。一方面,由于从事脑力劳动职业的父母通常拥有更高的社会经济地位,因而他们可以通过其拥有的社会关系和人脉资源帮助其子女通过考核,获得脑力劳动职业。另一方面,从事某一职业的父母在其职业范围内通常拥有更广泛的人脉资源关系,从而降低其子女从事该职业的门槛。此外,可能还有部分单位在招聘时会更倾向于父母社会地位高的求职者,因为这可以给他们带来更多的资源。

上述两条路径对子女职业的影响虽然都是代际传递的结果,但从劳动力市场化的角度来看,其对劳动力市场化的影响却是不同的。通过市场路径实现的代际传递虽然可能会带来职业代际流动固化问题,但是劳动者从事的职业最终还是由其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和比较优势决定的,职业代际传递带来的不平等在劳动者进入劳动力市场之前就已经存在,因而并不会对劳动力市场化程度带来负面影响。但是通过非市场路径实现的代际传递却不同,其通常不会将劳动者分配到最适合他的职业岗位上去,降低了市场机制优化资源配置的能力,可以认为,通过非市场路径实现的代际传递降低了劳动力市场化程度。具体来说,通过非市场路径对劳动者从事某一职业的概率造成的影响越大,其对劳动力市场上市场机制正常运行的干扰就越强,劳动力市场化程度就越低。

四、变量设定和统计描述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负责执行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2013年、2015年和2017年的数据。2017年CGSS

项目调查覆盖全国 31 个省份,共完成有效样本 12 582 份;2015 年的 CGSS 项目调查覆盖全国 28 个省份的 478 个村/居委会,共完成有效问卷 10 968 份;2013 年的 CGSS 项目调查覆盖全国 28 个省份的 478 个村/居委会,样本总量 11 439 个。在数据筛选过程中,由于本文研究的是劳动力市场问题,因此选择在城镇从事非农工作的劳动年龄人口作为本文使用的样本,按照中国的相关规定,劳动年龄人口定义为 16-60 周岁的男性及 16-55 周岁的女性,在剔除掉不满足上述要求的样本与相关变量值缺失、无法回答和不知道的样本之后,本文最终使用的 2013 年、2015 年、2017 年样本分别为 3 080 个、1 743 个、2 378 个。本文进行的数据分析及实证分析全部使用 stata15 软件实现。

变量设定见表 1。本文使用的被解释变量为子女职业类型,解释变量为样本父母的职业类型,控制变量包括样本的受教育水平、工作经验、省份和年份,其他变量包括样本的所属地区和户口类型。

职业分类的方法有很多种,有学者按所需技术及是否体力劳动将职业划分为四大类(Chan and Boliver,2013),有学者依照中国职业分类,按是否体力劳动和非体力劳动阶层将职业划分为三类和五类(李路路、朱斌,2015),有学者将职业分为蓝领、白领和农民(黄衍华、乔晓春,2017),还有学者按职业声望等指标对职业进行分类(张顺、祝毅,2017)。总体来看,对职业进行分类的依据大致有两种,第一种是按照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将职业进行划分,再在此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细分;第二种是按照职业声望等指标将职业进行划分,职业的指标得分通常取决于从事该职业人员的收入和受教育水平等因素。由于第二种划分方式通常依据个人特征,对职业本身的特征缺乏关注,因而本文采用第一种划分方式,即建立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分类基础上的职业划分方法。

虽然对职业的划分越细致越好,但是由于受到样本量的限制且为了便于分析,本文选择将职业类型按 CGSS 提供的职业编码分为脑力劳动职业(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职业(体力劳动者)两类,其中脑力劳动职业包括职业编码首位数字为 1、2、3、4 的职业,分别为立法者、高级官员和管理者,专业人员,技术人员和专业人员助理,办事员,这类职业的从业人员通常以脑力劳动为主,技术含量相对较高;体力劳动职业包括职业编码首位数字为 5、6、7、8、9 的职业,分别为服务人员及商店和市场销售人员,农业和渔业技术员,工艺及有关人员,机械机床操作员和装配工,非技术人员,这类职业的从业人员通常以体力劳动为主,技术含量相对较低。

本文使用的户口类型变量是按照样本被调查时的户口登记状况确定的,农业户口在 2015 年和 2017 年的数据中包括农业户口和以前是农业户口的居民户口,在 2013 年的数据中只包括农业户口;非农户口在 2015 年和 2017 年的数据中包括非农业户口和以前是非农业户口的居民户口,在 2013 年的数据中只包括非农业户口。

本文使用的受教育水平变量是按照样本被访时的最高教育程度及其相关情况确定的,小学及以下组包括受访时的最高教育程度为没有受过任何教育、私塾、扫盲班、小学的样本及初中未毕业的样本;初中组包括受访时的最高教育程度为初中毕业的样本及职业高中、普通高中、中专、技校未毕业的样本;中专和高中组包括受访时的最高教育程度为职业高中、普通高中、中专、技校毕业的样本及大学专科、大学本科未毕业的样本;大专及以上组包括受访时的最高教育程度为大学专科、大学本科毕业的样本和研究生及以上的样本。

本文使用劳动者的工作经验变量,而没有使用劳动者的年龄变量。主要是由于虽然父

母及其子女的职业会随其年龄的变化而变化,但相较于年龄而言,工作经验可以直接反映劳动者的人力资本积累水平,且其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地位具有更直接的影响。同时,劳动者的年龄和工作经验通常具有较强的相关性。

本文的地区变量包括东部、中部、西部地区。

表 1 本文使用变量及其设定

变量名称	变量设定
子女职业类型	按样本被访时所从事的主要非农工作的职业编码,分为脑力劳动职业和体力劳动职业,脑力劳动职业=1,体力劳动职业=0。
父母职业类型	按样本 14 岁时其父亲和母亲从事工作的职业编码,分为一个四水平的哑变量,即[(父职业=脑力劳动,母职业=脑力劳动),(父职业=脑力劳动,母职业=体力劳动),(父职业=体力劳动,母职业=脑力劳动),(父职业=体力劳动,母职业=体力劳动)]。
受教育水平	按照样本被访时的最高教育程度及其相关情况分为小学及以下、初中、中专和高中、大专及以上四组,其中小学及以下组为对照组。
工作经验	样本被访时从事非农工作的年限。
户口类型	按样本被访时的户口登记状况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户口,农业户口=0,非农户口=1。
地区	分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 ^①

表 2 给出了所使用样本的职业代际流动矩阵,其描述的是对于从事各类职业的父亲、母亲来说,其子女从事各类职业的占比情况。可以看出,子女职业和父母职业之间有很高的关联性,在父亲为脑力劳动者的样本中,子女与其父亲职业类型相同的比例超过 64%;对于从事脑力劳动职业的母亲,其子女有超过 70%也从事脑力劳动职业,相较于父亲而言更高。对于从事体力劳动职业的父母,其子女从事体力劳动职业的比例也更高。据此看来,我国存在职业代际传递现象,且这种现象在母亲与子女之间更为普遍。职业代际流动矩阵对职业代际传递情况进行了较为直观的描述,但父母职业对子女所在职业的影响有多大?其中有多少来自于非市场路径?还要进行更进一步的分析。

表 2 职业代际流动矩阵

	子女职业类型	父亲职业类型		母亲职业类型	
		脑力劳动(%)	体力劳动(%)	脑力劳动(%)	体力劳动(%)
2013 年	脑力劳动	64.04	32.95	70.47	34.89
	体力劳动	35.96	67.05	29.53	65.11
2015 年	脑力劳动	67.61	36.41	77.29	37.67
	体力劳动	32.39	63.59	22.71	62.33
2017 年	脑力劳动	67.86	36.99	74.6	38.05
	体力劳动	32.14	63.01	25.4	61.95

表 3 给出了各变量的统计描述情况。从受教育水平看,随时间推移,两类劳动者的平均受教育水平都呈上升趋势,但脑力劳动者的平均受教育水平提升更快,且大多受过高等教育,而体力劳动者中受过高等教育的占比较低。这当然和两种职业的性质有关,脑力劳动者多需要进行复杂劳动,而体力劳动者更多以简单重复劳动为主。从户口类型看,脑力劳动者

^①本文的地区变量包括东部、中部、西部地区,按照“七五”计划时期国家统计局使用的“东中西三大地带”经济区划(不包括港澳台地区),东部地区包括辽宁、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区包括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四川、重庆、云南、贵州、西藏。

多为非农户口,体力劳动者多为农业户口。导致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农业户口和非农户口样本在人力资本积累水平方面存在差距,也可能是因为脑力劳动者更有机会获得非农户口。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脑力劳动者占比更高。这一方面是由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产业结构更优,对人才的需求更加旺盛;另一方面是由于其经济发展迅速,工资水平较高,对人才的吸引力更大。同时,经济发展为东部地区居民的人力资本积累提供了便利条件,增加了人才供给。

表3 变量统计描述情况

	2013年				2015年				2017年			
	脑力劳动者		体力劳动者		脑力劳动者		体力劳动者		脑力劳动者		体力劳动者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小学及以下	0.05	0.21	0.25	0.44	0.03	0.18	0.23	0.42	0.03	0.17	0.24	0.43
初中	0.12	0.33	0.40	0.49	0.09	0.28	0.38	0.49	0.05	0.22	0.35	0.48
中专和高中	0.25	0.44	0.24	0.43	0.21	0.41	0.28	0.45	0.17	0.37	0.26	0.44
大专及以上学历	0.58	0.49	0.10	0.30	0.67	0.47	0.11	0.31	0.75	0.43	0.16	0.36
工作经验	14.56	10.07	13.49	9.39	14.86	10.24	14.74	9.99	15.67	12.63	17.30	14.86
户口类型	0.67	0.47	0.33	0.47	0.68	0.47	0.39	0.49	0.66	0.47	0.31	0.46
性别	0.56	0.50	0.63	0.48	0.49	0.50	0.57	0.50	0.51	0.50	0.57	0.49
东部地区	0.61	0.49	0.51	0.50	0.66	0.47	0.52	0.50	0.70	0.46	0.58	0.49
中部地区	0.22	0.42	0.28	0.45	0.24	0.43	0.33	0.47	0.17	0.37	0.25	0.43
西部地区	0.17	0.37	0.21	0.41	0.10	0.30	0.15	0.36	0.13	0.34	0.17	0.38
样本数	1 212		1 868		756		987		1 043		1 335	

五、计量模型及实证方法

由于本文的职业分类是二分法,因此选择使用 logit 模型进行分析。父母职业对子女职业的影响可以通过父母从事脑力劳动职业对子女从事脑力劳动职业概率的影响来反映,本文使用父母职业类型作为解释变量,子女职业类型作为被解释变量,回归方程如下:

$$P(\text{occu}_i = 1 | \text{parent_occu}_i, X_i) = \frac{\exp(\beta_1 \times \text{parent_occu}_i + \beta_2 X_i + \theta_{pt})}{1 + \exp(\beta_1 \times \text{parent_occu}_i + \beta_2 X_i + \theta_{pt})} \quad (1)$$

(1)式中:occu_i为样本 i 的职业类型,parent_occu_i为样本 i 父母的职业类型,X_i为控制变量,包括样本 i 的受教育水平和工作经验,β 为待估计系数,θ_{pt}为省份×时间固定效应,省份为行政省份,时间为年份。考虑到同一地区的各个省份之间可能存在较大差异,为更好地控制固定效应,本文以省份为控制变量。

根据前文的分析,父母职业类型对其子女职业类型的影响是市场路径和非市场路径共同作用的结果,而职业代际流动对劳动力市场化程度的影响是通过非市场路径实现的,为得到职业代际流动对劳动力市场化程度的影响,需将通过非市场路径造成的影响分离出来。在对式(1)进行回归时,可先仅对解释变量和省份×时间固定效应进行回归,再对市场路径的影响因素X_i加以控制后进行回归,两个回归结果的边际效应之差即为非市场路径的影响。

为保证回归方程成立,需要注意遗漏变量问题。根据前文的分析,通过市场路径影响职业代际传递的因素既包括基因等遗传因素、义务性的初等、中等教育及高等教育中的基础课程等普通人力资本要素,又包括父母的耳濡目染和言传身教、中等教育及高等教育中的职业

教育及专业课程、工作经验、相关培训等特殊人力资本要素,还包括由父母造成的子女的职业偏好。但由于数据所限,这些因素中的大部分是无法获得的,最终本文选择了劳动者的受教育水平和工作经验作为衡量市场路径造成影响的因素,通过对劳动者的受教育水平和工作经验加以控制,可以得到职业代际传递对劳动力市场化程度影响的上限。这样的变量选择不会产生较大偏误,原因如下。

被遗漏的变量主要包括基因等遗传因素、父母的耳濡目染和言传身教、相关培训、父母造成的子女职业偏好,下面逐一分析这些因素通过市场路径造成的影响。第一,基因等遗传因素。平均来看,劳动者的基因等遗传因素通常与其受教育水平是息息相关的,因而受教育水平变量中包含着大量基因等遗传因素的信息,所以通过对受教育水平的控制,可以在较大程度上控制住基因等遗传因素造成的影响。第二,相关培训。在就业以后,劳动者尤其是脑力劳动者参加的培训,其主要目的多是提升自己的职业技能,而这与其工作年限,也就是本文中使用的的工作经验变量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因而通过对工作经验变量的控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住相关培训造成的影响。第三,父母的耳濡目染和言传身教。从脑力劳动的职业特点来看,其从业者通常都要在接受过系统的教育和训练后,才可以胜任脑力劳动职业的相关岗位,而在大多数情况下,父母对子女的影响仅限于在早期让子女对该职业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和简单的认识,而非培养子女从事某一职业所需的具体技能,因而其造成的影响较教育和工作经验来讲要小得多。第四,父母造成的子女职业偏好。通常而言,父母多会影响其子女的职业偏好,但需要注意的是,虽然许多子女倾向于从事与其父母相同的职业,但也有不少子女倾向于从事与其父母不同的职业,这会使得父母造成的子女职业偏好对职业代际传递的平均影响较小。总体而言,虽然在控制住受教育水平和工作经验之后,这些遗漏变量通过市场路径对子女职业选择造成的影响有限,但依然是存在的,且基因等遗传因素、父母的耳濡目染和言传身教、相关培训等因素既与父母是否从事脑力劳动职业正相关,又与子女是否从事脑力劳动职业正相关,因而在仅控制受教育水平和工作经验的情况下,得到的职业代际传递对劳动力市场化程度的影响是一个上限。

根据前文的分析,职业代际流动固化会影响中国劳动力市场上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造成劳动力资源配置扭曲,降低劳动力市场化水平。因而,可以通过职业代际传递情况来衡量代际传递对劳动力市场化程度的影响。可以认为,在劳动力市场上,父母职业类型对子女职业类型的影响越大,劳动力市场化水平就越低。不妨考虑两种极端的情形,假设有两个社会 A 和 B,在社会 A 中,子女完全继承其父母的职业,也就是说子女职业类型完全由其父母的职业类型决定,而与子女自身的人力资本积累水平、比较优势、偏好等个人特征无关,此时父母从事脑力劳动职业会使其子女从事脑力劳动职业的概率上升至 100%,且影响全部来自非市场路径;在社会 B 中,父母职业类型不会通过非市场路径对其子女的职业类型造成影响,也就是说子女职业类型完全取决于其自身的人力资本积累水平、比较优势、偏好等个人特征要素,在对这些要素加以控制之后,父母从事脑力劳动职业对其子女从事脑力劳动职业概率的影响为 0。如果在这两个社会中不存在任何其他干预劳动力市场上市场机制正常运行的因素,毫无疑问,在上述两个社会中,社会 A 中的劳动力市场在配置劳动力资源方面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可以说在社会 A 中根本不存在劳动力市场;而在社会 B 中,劳动力市场充分发挥了其优化配置劳动力资源的能力,不存在非市场路径造成的扭曲。因而,可以使用父母职业类型通过非市场路径对子女职业类型造成的影响大小测度职业代际流动性对劳动力市场

化程度的影响。更进一步来说,可以将父母从事脑力劳动职业通过非市场路径对子女从事脑力劳动职业概率造成的影响,作为从代际流动性角度衡量劳动力市场化程度的指标。若父母从事脑力劳动职业通过非市场路径使得子女从事脑力劳动职业的概率提高到100%,则劳动力市场化程度为0;若没有使子女从事脑力劳动职业的概率得到提高,则未对劳动力市场化程度产生影响。

设通过非市场路径,父母从事脑力劳动对子女从事脑力劳动的平均边际效应为 M 。当不存在职业代际流动固化问题造成的扭曲时,每个样本的边际效应 $M_i = 0$,记此时的平均边际效应为 M_1 ,则有 $M_1 = \frac{1}{n} \sum_{i=1}^n M_i = 0$,其中 n 为样本数,此时的劳动力市场化程度(MLM)为1。当子女能否从事脑力劳动职业完全由其父母的职业类型决定时,需分情况说明。为方便分析,假定父母职业类型对其子女职业类型的边际影响相同。此时,若父母皆为脑力劳动者,则其子女为脑力劳动者的概率为1;若父母有1人为脑力劳动者,则其子女为脑力劳动者的概率为0.5;若父母皆为体力劳动者,则其子女为脑力劳动者的概率为0。由于子女职业完全由其父母职业决定,不受其他因素影响,所以当且仅当 $M_i = 1$ 时,上述情况成立。记此时的平均边际效应为 M_2 ,有 $M_2 = \frac{1}{n} \sum_{i=1}^n M_i = 1$,此时的劳动力市场化程度(MLM)为0。若假定边际影响是同质的,即职业代际传递造成的影响(M)与劳动力市场化程度(MLM)之间为线性关系,则有:

$$MLM = 1 - M \quad (2)$$

按上述分析,根据(1)式得到的 M 为哑变量“父职业=脑力劳动,母职业=脑力劳动”的平均边际效应,记为 M' ,将 M' 代入(2)式,即可得到从职业代际传递的角度衡量的劳动力市场化程度。

六、实证结果

(一) 基础回归结果

表4给出了子女职业类型与父母职业类型的logit模型回归结果,其中模型1、2分别为仅考虑解释变量和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表4的结果显示,第一,父母职业会显著地影响其子女的职业,且母亲职业的影响要大于父亲职业。具体而言,仅父亲从事脑力劳动职业可以使子女从事脑力劳动职业的概率提升20.30%,仅母亲从事脑力劳动职业可以使该概率提升24.76%,父母皆从事脑力劳动可以使该概率提升38.39%。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首先,女性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的提高使得母亲在子女的教育和培养方面有了更大的话语权;其次,母亲在其子女成长期间通常会花费比父亲更多的时间在子女身上,因而母亲对其子女的影响可能更为深远。第二,子女的受教育水平和工作经验对其职业也具有非常显著的影响,在对这两个变量进行控制之后,父母职业对其子女职业的影响明显减小。具体而言,通过非市场路径,仅父亲从事脑力劳动职业可以使子女从事脑力劳动职业的概率提升8.40%,仅母亲从事脑力劳动职业可以使该概率提升5.69%,父母皆从事脑力劳动职业可以使该概率提升11.14%。不难发现,在剔除掉市场路径造成的影响之后,父母职业类型对子女职业类型造成的影响虽大幅减小,但仍然显著,表明父母与子女之间的职业代际传递主要是通过市场路径实现的,但非市场路径也起到了显著的作用,且在部分剔除掉通过

市场路径造成的影响后,父亲职业对其子女职业的影响超过了母亲,这表明母亲职业对其子女职业的影响更多是通过市场路径实现的。第三,对子女职业类型影响最大的因素是受教育水平,接受过中高等教育可以显著地提升子女从事脑力劳动职业的概率,尤其是接受过高等教育,可以使子女从事脑力劳动职业的概率提升约 67%。为保证回归结果可信,对回归中涉及的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VIF 值均未超过 3,可以认为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①。

表 4 子女职业类型与父母职业类型的 logit 模型回归结果

	模型 1		模型 2	
	系数/t 统计量	平均边际效应	系数/t 统计量	平均边际效应
父职业 = 脑力劳动,母职业 = 脑力劳动	1.8079*** (18.1442)	0.3839	0.7290*** (6.4737)	0.1114
父职业 = 脑力劳动,母职业 = 体力劳动	0.9561*** (12.5634)	0.2030	0.5501*** (6.0542)	0.0840
父职业 = 体力劳动,母职业 = 脑力劳动	1.1663*** (9.5981)	0.2476	0.3722*** (2.6500)	0.0569
工作经验			0.0132*** (4.9940)	0.0020
初中			0.4067*** (3.3333)	0.0453
中专和高中			1.6392*** (14.2188)	0.2672
大专及以上			3.4646*** (29.0244)	0.6692
省份	控制		控制	
时间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0.0491 (0.4659)		-2.1274*** (-12.8173)	
样本数	7 201		7 201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1%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下同。

根据模型 2,可得到职业代际传递的平均边际影响为 11.14%,根据式(2),可以得到从代际流动性角度衡量的劳动力市场化程度为 88.86%。该结果表明职业代际传递对中国劳动力市场化程度的影响不是太大,且根据前文的分析,该影响只是一个上限,也就是说这里得到的劳动力市场化程度只是一个下限,实际的劳动力市场化程度应该更高,这也更表明了职业代际传递对中国劳动力市场化程度造成的影响有限。

(二) 稳健性检验

为保证上述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分别从改变职业分类、更换解释变量、扩大样本范围、考虑内生性问题 4 个方面进行稳健性检验。

1. 改变职业分类

如前所述,职业分类的方法有很多,本文采用的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二分法,为进行检验,本文将职业类型重新划分为专业和管理层、技术非体力职业层、技术体力职业层、非

^①篇幅所限,检验结果备索。

技术体力职业层四类,其中专业和管理层包括职业编码首位数字为1、2的职业,技术非体力职业层包括职业编码首位数字为3、4的职业,技术体力职业层包括职业编码首位数字为5、7、8的职业,非技术体力职业层包括职业编码首位数字为6、9的职业。由于职业分类变为四类,需使用mlogit模型进行分析,将专业和管理层设定为基准组,回归结果见表5。可以看出,父母的职业类型对子女选择与其同类型职业的概率提升最为明显,这验证了职业代际传递的存在,与前文结果基本一致。

表5 职业四分类 mlogit 模型回归结果

	技术非体力职业层	技术体力职业层	非技术体力职业层	技术非体力职业层	技术体力职业层	非技术体力职业层	技术非体力职业层	技术体力职业层	非技术体力职业层
父亲为技术非体力职业层	0.3933*** (3.0406)	0.4286*** (2.8153)	0.4615* (1.7996)						
父亲为技术体力职业层	0.3131*** (2.8158)	0.7620*** (6.1333)	0.6237*** (3.0483)						
父亲为非技术体力职业层	-0.0332 (-0.3163)	0.7118*** (6.2431)	0.7925*** (4.3036)						
母亲为技术非体力职业层				0.4060*** (2.7203)	0.2845 (1.5208)	0.2314 (0.6060)			
母亲为技术体力职业层				0.3929*** (2.9435)	0.6098*** (3.8151)	0.4644 (1.4709)			
母亲为非技术体力职业层				-0.1573 (-1.2441)	0.5073*** (3.3956)	0.6990** (2.3610)			
父母为技术非体力职业层人数							0.3466*** (3.7794)	0.3326*** (2.9781)	0.3431* (1.7211)
父母为技术体力职业层人数							0.2848*** (3.7855)	0.5696*** (6.4476)	0.4628*** (2.9567)
父母为非技术体力职业层人数							-0.0022 (-0.0320)	0.4888*** (6.1563)	0.5629*** (4.0028)
工作经验	-0.0073** (-2.1699)	-0.0186*** (-5.7111)	-0.0100** (-2.3984)	-0.0068** (-2.0365)	-0.0198*** (-6.1270)	-0.0108*** (-2.5991)	-0.0068** (-2.0136)	-0.0185*** (-5.6820)	-0.0097** (-2.3209)
初中	0.0267 (0.1152)	-0.2358 (-1.2758)	-0.7879*** (-4.0028)	0.0132 (0.0572)	-0.2644 (-1.4327)	-0.8116*** (-4.1289)	0.0101 (0.0438)	-0.2462 (-1.3331)	-0.7897*** (-4.0134)
中专和高中	-0.1538 (-0.7256)	-1.5106*** (-8.8133)	-2.3704*** (-12.3054)	-0.2015 (-0.9505)	-1.5545*** (-9.0809)	-2.3911*** (-12.4232)	-0.2025 (-0.9538)	-1.5204*** (-8.8616)	-2.3546*** (-12.1939)
大专及以上	-0.7069*** (-3.4432)	-3.5721*** (-20.9028)	-5.1533*** (-21.6136)	-0.7884*** (-3.8321)	-3.6323*** (-21.2045)	-5.1668*** (-21.5443)	-0.7753*** (-3.7583)	-3.5598*** (-20.7346)	-5.1041*** (-21.2625)
省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0.6168** (2.4343)	2.0789*** (8.6744)	1.2703*** (3.7358)	0.6572** (2.5056)	2.2489*** (8.7808)	1.3512*** (3.3280)	0.5071* (1.9038)	1.7999*** (6.8655)	0.9571** (2.4068)
样本数	7 201	7 201	7 201	7 201	7 201	7 201	7 201	7 201	7 201

注:括号中为t统计量值。

2. 更换解释变量

将原先四水平哑变量的解释变量更换为父母从事脑力劳动人数,回归结果见表6。可以

看出调整解释变量后的回归结果与表 4 中的回归结果基本一致,可以认为通过了稳健性检验。

表 6 以父母从事脑力劳动人数为解释变量的 logit 模型回归结果

	系数	t 统计量
父母从事脑力劳动人数	0.4072 ***	(8.1349)
工作经验	0.0135 ***	(5.1016)
初中	0.4127 ***	(3.3845)
中专和高中	1.6428 ***	(14.2556)
大专及以上	3.4618 ***	(29.0223)
常数项	-2.1275 ***	(-12.8225)
省份		控制
时间		控制
样本数		7 201

3. 扩大样本范围

将满足劳动年龄人口的乡村样本纳入回归样本,回归结果见表 7。回归结果显示,在将乡村样本纳入后,模型 3、4 的回归结果与模型 1、2 的回归结果基本一致,可以认为通过了稳健性检验。

表 7 含乡村样本的 logit 模型回归结果

	模型 3	模型 4
父职业=脑力劳动,母职业=脑力劳动	1.8537 *** (19.0533)	0.7075 *** (6.4157)
父职业=脑力劳动,母职业=体力劳动	0.9466 *** (13.1394)	0.5438 *** (6.2655)
父职业=体力劳动,母职业=脑力劳动	1.2504 *** (10.3816)	0.3954 *** (2.8251)
工作经验		0.0126 *** (5.1119)
初中		0.4598 *** (4.0785)
中专和高中		1.7343 *** (16.2045)
大专及以上		3.5691 *** (32.0780)
省份	控制	控制
时间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0.1374 (1.3055)	-2.1684 *** (-13.4966)
样本数	8 390	8 390

注:括号中为 t 统计量值。

4. 内生性问题

(1)式的回归模型虽然不存在反向因果问题,但可能存在遗漏变量问题,由此带来的内生性可能会导致回归结果偏误。为方便讨论内生性问题,本文使用线性概率模型代替先前使用的 logit 模型。对比表 4 和表 8,可以看出线性概率模型的回归结果与 logit 模型基本一致。本文用父母受教育年限之和作为父母脑力劳动人数的工具变量,一方面,父母的受教育情况与其职业类型联系紧密;另一方面,在控制父母职业类型后,父母受教育情况对子女的

职业类型不会有直接影响。设定小学及以下、初中、中专和高中、大专及以上的受教育年限分别为6年、9年、12年、16年。

根据表8,工具变量回归的结果与线性概率模型的回归结果方向和显著性水平一致,大小差异不大。回归的 Anderson canon. corr. LM 统计量为 2129.678,对应 P 值为 0.0000, Cragg-Donald Wald F 统计量为 3046.384,大于 Stock-Yogo 弱工具检验 10%的阈值 16.38,可以认为不存在识别不足和弱工具变量的问题。^①

表 8 内生性问题回归结果

	线性概率模型	工具变量回归
父母从事脑力劳动人数	0.0674*** (8.6147)	0.0766*** (5.3430)
工作经验	0.0021*** (5.1358)	0.0022*** (5.1315)
初中	0.0411*** (2.7478)	0.0416*** (2.7309)
中专和高中	0.2607*** (16.9432)	0.2640*** (16.6799)
大专及以上	0.6594*** (42.6824)	0.6579*** (38.5807)
省份	控制	控制
时间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0.1242*** (5.3195)	0.0049 (0.1536)
样本数	7 201	6 996

注:括号中为 t 统计量值。

综上,可以认为表 4 的回归结果是可信的。

(三) 异质性分析

本文的异质性分析共分为两组,一组分别对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样本进行分析,另一组分别对农业户口和非农户口的样本进行分析。由于在对样本分组后,以四分类哑变量作为解释变量会导致部分分组内某一类的样本过少,考虑到以父母从事脑力劳动人数为解释变量与以四分类哑变量为解释变量得到的结果基本一致,因此此部分以父母从事脑力劳动人数作为解释变量。

表 9 给出了按地区分类的 logit 模型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不论在东部、中部还是西部地区,皆存在着父母和子女之间的职业代际传递现象,且市场路径皆是职业代际传递的主要路径,但在西部地区,非市场路径的作用较东部和中部地区更加明显。具体而言,在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父母从事脑力劳动人数每增加 1 人,子女从事脑力劳动的概率分别会提升 20.24%、18.97%、20.91%,其中通过非市场路径提升的概率分别为 6.56%、5.27%、7.41%。此外,还可以发现各地区对子女职业类型影响最大的因素都是教育,且在西部地区教育的影响最为显著。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于东部和中部地区,因而其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也应小于东部和中部地区,在这种情况下,接受过高等教育却可以使劳动者从事脑力劳动职业的概率得到更大的提升,这体现出了西部地区高素质人才的匮乏。

^①限于篇幅,结果未报告在正文中,备索。

表 9 按地区分类的 logit 模型回归结果

	东部地区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西部地区
父母从事脑力劳动人数	0.9392*** (0.2024)	0.4105*** (0.0656)	0.9102*** (0.1897)	0.3615*** (0.0527)	1.0071*** (0.2091)	0.5461*** (0.0741)
工作经验		0.0066* (0.0011)		0.0187*** (0.0027)		0.0231*** (0.0031)
初中		0.3729** (0.0448)		0.2971 (0.0305)		0.6402** (0.0673)
中专和高中		1.6109*** (0.2772)		1.5868*** (0.2481)		1.7305*** (0.2556)
大专及以上		3.2677*** (0.6458)		3.5396*** (0.6774)		4.0913*** (0.7383)
省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0.0602	-1.9568***	-0.1491	-1.4498***	-0.8950***	-2.6156***
样本数	4 202	4 202	1 812	1 812	1 187	1 187

注:括号中为边际效应。

表 10 给出了按户籍类型分类的 logit 模型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不论对于农业户口样本还是非农户口样本,父母和子女之间都存在明显的职业代际传递现象,且皆以市场路径为主,但非农户口样本受非市场路径影响要比农业户口样本大得多。具体而言,对于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样本,父母从事脑力劳动人数每增加 1 人,子女从事脑力劳动的概率会分别提升 13.53% 和 15.59%,其中通过非市场路径提升的概率分别为 3.72% 和 6.84%。这表明非农户口劳动者在寻找工作的过程中更有可能从其父母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关系中获益,农业户口劳动者则会处于天然的劣势地位。导致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农业户口劳动者的父母通常也是农业户口,一方面他们即使获得了脑力劳动职业,也多从事的是脑力劳动职业中技术含量较低的职业;另一方面,由于文化和观念方面的差异,他们很难融入到当地社会中,因而其交往的圈子和可能获得的人脉资源会受到很大限制,所以难以通过非市场路径提升其子女获得脑力劳动职业的概率。

表 10 按户籍类型分类的 logit 模型回归结果

	农业户口	农业户口	非农业户口	非农业户口
父母从事脑力劳动人数	0.7357*** (0.1353)	0.2779** (0.0372)	0.7115*** (0.1559)	0.4012*** (0.0684)
工作经验		0.0121*** (0.0016)		0.0107*** (0.0018)
初中		0.4138*** (0.0379)		0.2361 (0.0358)
中专和高中		1.5950*** (0.2237)		1.3835*** (0.2712)
大专及以上		3.5687*** (0.6669)		3.0627*** (0.6255)
省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0.1938	-1.9005***	0.3090**	-1.8458***
样本数	3 768	3 768	3 433	3 433

注:括号中为边际效应。

七、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使用 CGSS 2013 年、2015 年和 2017 年的数据,将职业类型划分为脑力劳动职业和

体力劳动职业两类,将父母职业对其子女职业造成影响的路径分为市场路径和非市场路径两条,使用 logit 模型进行分析,进而从代际流动性的角度对中国劳动力市场化程度进行了测度,得到的主要结果及结论如下。

第一,总体来看,父母职业会显著影响其子女的职业,子女选择从事与其父母相同类型职业的概率更高,该影响主要是通过市场路径实现的,但通过非市场路径产生的影响也十分显著。第二,母亲职业对子女职业的影响比父亲职业更大,但通过非市场路径造成的影响却小于父亲职业,这表明母亲职业对其子女职业的影响更多是通过市场路径实现的。第三,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父母职业对其子女职业皆有显著影响,且主要通过市场路径实现,但通过非市场路径造成的影响也皆十分显著,且这种影响在西部地区更大。第四,不论是农业户口还是非农户口的劳动者,父母职业对其子女职业的影响皆十分显著,且主要通过市场路径实现,但对于非农户口劳动者,其父母职业通过非市场路径对其职业产生的影响要比农业户口劳动者显著得多。第五,不论从总体上来说,还是分地区、分户籍类型来看,劳动者的受教育水平都是决定其职业类型最重要的因素,尤其是接受过高等教育,可以非常显著地提升其获得脑力劳动职业的概率。在西部地区,接受过高等教育对获得脑力劳动职业的帮助超过东部和中部地区。第六,职业代际传递通过非市场路径使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化程度降低了不足 11.14%,表明其对中国劳动力市场化程度的影响有限。

据此,本文给出的政策建议如下。第一,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拥有城市户口的劳动者在寻找工作的过程中更可能得到来自其父母的帮助,这就使得农业户口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天然劣势的地位,不但破坏了劳动力市场上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阻碍了公平的实现,还降低了劳动力市场上的代际流动性,导致阶层固化。因此,应逐步取消部分城市的落户限制,确保所有居民在落户、就业、公共服务等方面享受同等待遇。第二,加强区域之间的协同发展。分地区来看,在西部地区,父母职业通过非市场路径对其子女职业的影响更大,表明各地区的劳动力市场化改革进程存在差距。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其劳动力市场化改革进程的迟滞可能会进一步加剧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此外,是否受过高等教育在西部地区对劳动者职业类型的显著影响也表明了西部地区的人才匮乏,因此,还需继续鼓励人才向西部流动,推动西部地区的发展。第三,增加对教育尤其是对高等教育的投资。一方面,本文的结果显示出劳动者的受教育水平,尤其是是否接受过高等教育是决定其职业类型最重要的因素,这表明市场为劳动者提供了相对公平的向脑力劳动职业流动的机会,政府应继续加大对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投入,为体力劳动者及其子女提供更多接受教育的机会,以防止代际流动固化。另一方面,由于通过市场路径实现的职业代际传递现象更为突出,从事脑力劳动职业的父母可以为孩子提供更高水平的教育,进而造成机会不平等,导致贫富差距增大和阶层固化,从这个角度来看,加大教育投资力度,保障教育的公平性,也可以缓解机会不平等,保障劳动力市场上的公平性和社会的稳定。

参考文献:

1. 褚翠翠、孙旭,2019:《中国职业代际流动的趋势及子代教育的作用》,《劳动经济研究》第7期。
2. 黄衍华、乔晓春,2017:《子女职业地位获得更依赖于父亲还是母亲?——来自1990年人口普查的历史证据》,《人口与发展》第2期。
3. 李路路、朱斌,2015:《当代中国的代际流动模式及其变迁》,《文化纵横》第5期。
4. 许庆红,2018:《市场转型、劳动力市场分割与代际行业流动》,《青年研究》第2期。
5. 张桂金、张东、周文,2016:《多代流动效应:来自中国的证据》,《社会》第3期。

- 6.张顺、祝毅,2017:《城市居民代际职业流动性变迁及其阶层差异》,《中国人口科学》第3期。
- 7.Becker, G. S., and N. Tomes. 1979. "An Equilibrium Theory of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and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7(6): 1153-1189.
- 8.Carmichael, F. 2000.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and Occupational Status in Britain." *Applied Economics Letters* 7(6): 391-396.
- 9.Chan, T. W., and V. Boliver. 2013. "The Grandparents Effect in Social Mobility: Evidence from British Birth Cohort Stud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8(4): 662-678.
- 10.Di Pietro, G., and P. Urwin. 2003.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and Occupational Status in Italy." *Applied Economics Letters* 10(12): 793-797.
- 11.Feigenbaum, J. J. 2018. "Multiple Measures of Historical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Iowa 1915 to 1940." *The Economic Journal* 128(612): F446-F481.
- 12.Goldberger, A. S. 1989. "Economic and Mechanical Models of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9(3): 504-513.
- 13.Hellerstein, J. K., and M. S. Morrill. 2011. "Dads and Daughters: The Changing Impact of Fathers on Women's Occupational Choices."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46(2): 333-372.
- 14.Hout, M. 2018. "Americans' Occupational Status Reflects the Status of Both of Their Parent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5(38): 9527-9532.
- 15.Long, J., and J. Ferrie. 2013. "Intergenerational Occupational Mobility in Great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1850."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3(4): 1109-37.
- 16.Loury, L. D. 2006. "Some Contacts Are More Equal than Others: Informal Networks, Job Tenure, and Wages."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24(2): 299-318.
- 17.Mazumder, B., and M. Acosta. 2015. "Using Occupation to Measure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657(1): 174-193.
- 18.Modalsli, J. 2017.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in Norway, 1865-2011." *The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119(1): 34-71.
- 19.Solon, G. 1992. "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Mobi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2(3): 393-408.
- 20.Zimmerman, D. J. 1992. "Regression toward Mediocrity in Economic Statur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2(3): 409-429.

Occupational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and China's Labor Marketization

Shan Shuang

(Department of Urban and Rural Construction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of CGSS in 2013, 2015 and 2017, this paper studies occupational intergenerational solidification and its effects on the marketization degree of labor market in China by using logit model. The study finds that in China, children are more likely to choose a similar occupation as their parents, and the influence of parents' occupation on their children's is mainly realized through the market path. Mother's occupation has a greater impact on children's, but the impact through non market path is less. The education level of workers is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determining their occupation. In particular, having received higher education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probability of a worker obtaining mental work occupation. In each group of samples, the occupational type of children is influenced by their parents' occupational type. But for the western region and non agricultural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amples, the impact brought by non market paths is more significant. The influence of occupational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n the degree of labor market in China is very limited, which only reduces the degree of labor market by less than 11.14%.

Keywords: Occupation,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Labor Market, Marketization

JEL Classification: J42, J79, J62

(责任编辑:彭爽)